

试论呼伦贝尔草原文化地域特征

敖·查赫轮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呼伦贝尔草原文化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持久互动中形成。地缘文化内涵丰富的呼伦贝尔草原文化的多样文化、生态环保、持久互动和包容整合四大特征既很突出, 又成整体, 互不离开。即这四大特征整合成为呼伦贝尔草原文化的地域性。这可谓在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体系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魅力。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北纬46°以北中温带和寒温带自然地理环境中绝无仅有的多元立体民族文化特殊区域。对其生态保护理念和传统人文经验的吸收与发扬有助于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棘手问题。

关键词: 呼伦贝尔草原文化; 地域特征; 多样文化; 生态环保; 包容整合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一、多样文化特征

呼伦贝尔地处大兴安岭北部(南半部则是位于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交接地带), 两侧的原始森林和典型草原地带, 水资源丰富(占全国总量1%), 河网密布, 地貌和气候多样性相对突出。在此自然地理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民族与经济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呼伦贝尔地区各民族均有各自的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各民族内部也有一定的文化习俗差异, 这主要与其长期的游牧经济和游牧迁徙活动以及历史因素有关。主体民族-蒙古族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影响广泛。额尔古纳河一带是蒙古族发源地, 也是自然环境至今仍然保持良好的地区, 是远近闻名的民族生态文化旅游区。现在蒙古族大部分居住在大兴安岭以西牧区四旗的广袤平坦的温带高平原, 参与和从事传统游牧经济与现代多种产业相结合的定居或半定居生活。额尔古纳河、克鲁伦河、乌尔逊河、海拉尔河、伊敏河、辉河、呼伦湖、贝尔湖、宝格达乌拉山、巴彦乌拉山是哺育和滋润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的壮丽山河。在辽阔的巴尔虎大草原上蒙古族民众永无止境地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游牧文化艺术。《辽阔的草原》、《褐色的鹰》、《巴彦巴尔虎更夫》、《乌和尔图辉腾浩尔》等蒙古族“乌日汀道”(长调)以及众多的英雄史诗和祝赞词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和体现出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传统文化心理的独特性。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长调曲调舒缓, 歌词少而精, 哲理性强, 情感真实。平面、舒缓、原生态特色使蒙古族乌日汀道(长调)进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和根河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和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的鄂温克族在辽阔的草甸草原和波状草原上游牧生活, 并创造出灿烂而独特的草原民族文化。根河市的鄂温克族及其它一些农区的鄂温克族也拥有原创丰富的狩猎文化和夹杂传统因素的传统农耕文化。鄂温克族舞蹈动作刚健有力, 明朗悠扬, 对大自然的模仿和赞颂特色浓厚。《篝火舞》是豪放、朴实, 富有草原和森林气息。

鄂伦春族居住区有大兴安岭纵贯南北, 小兴安岭沿黑龙江斜向东南。大小兴安岭无数条山溪, 汇成了许多气势磅礴的河流和清澈如镜的湖泊。鄂伦春族社会生产长期以来是以狩猎为主, 采集和捕鱼为辅。鄂伦春族男孩子从七、八岁起, 就跟着父亲学习打猎、捕鱼, 从小就培养起对狩猎的兴趣和技能。十五、十六岁后就能单枪匹马地出没于山林。鄂伦春族称打猎好的人为“阿亚莫日根”。好猎手很受尊敬, 大家都愿意同他一起打猎。姑娘也愿意找这样的对象。就像非集权政治社会中依靠品质和能力获得权力的“头人”一样具有影响力。歌谣是鄂伦春人口头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鄂伦春族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唱民歌叫“扎思达勒”。歌谣的曲调都是比较固定的, 歌词却是

即兴之作，人们根据不同的场合，一边填词，一边歌唱。”[1]在独特的自然、经济环境里形成了鄂伦春族独有的传统狩猎社会文化。

达斡尔族的主要聚居区是富饶美丽的嫩江两岸，特别是嫩江右岸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县是达斡尔族最集中的地方。达斡尔族村庄都具有独特风格，依山傍水，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嫩江一线。达斡尔族生态文化和传统艺术十分丰富，民间舞蹈历史悠久。《鲁日歌勒》、《哈肯拜》等舞蹈很具特色。民间文学也很丰富，内容有关于人类起源的，膜拜大自然景色的，最具特色的是叙述和赞颂英雄人物的神话传说。

从文化地理学角度看，呼伦贝尔草原各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是构成该区域总体文化生态的基本因素，也是其生命力和基本动力根源所在。“文化地理学在作出文化空间格局判断时，所使用的理论正是德国哲学家赫德尔所提倡的文化相对论。该文化理论的发展必然发展为多元文化论，而多元文化论已经繁荣并发展成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成熟的理论。”[2]从地理空间非均质角度看，呼伦贝尔市蒙古族和鄂温克族大部分居住在大兴安岭以西典型草原地带，并主要从事畜牧业经济生产，游牧文化活跃；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大部分居住在大兴安岭主脊及以东的森林和平原地带，并主要从事狩猎和农耕经济生产，狩猎文化和农耕文化底蕴丰厚。同时也必须看到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频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索伦部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三族在传统的居住地域方位上也体现着彼此间良好的关系和密切的文化联系。一般来说，鄂伦春族多居住在山岭上，可谓是‘山岭上的人们’；鄂温克族居住地既多茂密的森林，又有平缓的坡地，鄂温克族即是‘住在山林中的人们’；而达斡尔族则主要居住在山脚下，河流下游的平原地带，那里有大量可耕的土地，因此达斡尔族也即是‘耕种的人’”。[3]虽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各民族地理垂直分布特征相比，有点平面化，但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重叠多样，并均有可遵循的文化地理规律。“在滇东南文山州有‘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的说法；而在滇西南的德宏傣族景颇族州，住热带河谷的是傣族，亚热带半山区的是景颇族和德昂族，温凉半山半坝区是阿昌族，高寒山区是傈僳族。”[4]而就呼伦贝尔地区而言，从总体文化地理分布上看，蒙古族主要分布于干旱典型草原；鄂温克族分布于草甸草原；达斡尔族分布于嫩江平原；鄂伦春族分布于森林和山地。即呼伦贝尔区域东部为达斡尔族，西部为蒙古族，南部为鄂温克族，北部为鄂伦春族。东西南北，错落有致，分工互补，特色鲜明。因此在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化特征基础上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传统民族经济文化系统。正如云南、贵州的多样性地貌单位造就了丰富多彩的互补性强的民族文化一样，呼伦贝尔草原的相对多样化地理特征和社会文化流动性也创造了内蒙古地区乃至全国中高纬度少有的，文化异质性较高而互补性也强的多民族文化生态。

二、生态环保特征

众所周知，呼伦贝尔草原是目前在全中国为数较少的未受或少受污染和破坏的原生态环境之一。除传统文化内部制衡与国家政策外部调控之外，该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丰富性及脆弱性起着重要的自我保护和平衡作用。“人类社会，无论过去、现在与将来，都不可能彻底脱离自然生态系统而超然存在。为了维护寄生关系的稳态延续，人类社会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必然是主流。”[5]

呼伦贝尔市地处于北纬 47° 以北，东经 126° 以西的山地、丘陵和草原。虽说是内蒙古自治区水草条件最好，自然风景独特的区域，但由于受自然地理和气候因素的制约，便形成典型的中温、寒温带的干旱草原和山林，并寒冷、干旱、风雪等自然灾害较为频繁。气温低、降水量少、风沙大等地理与气候特点客观上促成生态环境系统和民族文化系统的高度一体化，从而限制对土壤和森林的人为破坏和超载，保护和维持了呼伦贝尔草原地带原始生境。比如，冬季漫长，冰雪深厚等特点，实际上保证了该地区土壤长达 6-8 月的休养和“冬眠”。与此同时，该地区处于偏远，距中国农业人口密集区有几百到几千公里，加之东部和南部是以大兴安岭为天然屏障，明显阻隔与周边农区的交往，因此大量移民和开垦行为自然就没必要存在了。呼伦贝尔草原区域之所以至今能保持住基本原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中形成的民俗生态文化的制衡与调控。“人类刚从自然界走出来的时候，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人完全依赖自然界生活，因而在人类思想上产生了对动物和自然界的尊重。尊重自然界的思想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到现在，从人类赖以发展的产业基础来看，共经历了狩猎与采集文明 - 农业文明 - 工业文明三种形态。在前

两种文明的形态下，人与自然是处于蒙昧生态的关系。人对环境虽然有所影响，但造成的破坏较小，是局部的，总体上与自然保持着一种和睦共处的协调关系。”[6]

呼伦贝尔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都是生态类型文化。地方性生态知识丰富，能规避本地生态脆弱环节的文化经验广布，生态文化特质众多，生态理念根深蒂固等是具体体现。这些对其生态环境发挥着文化性保护和调节作用。“生态与文化有互动关系。一般说来，在人类社会早期，生态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要大一些；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文化对生态的作用变得愈来愈大，特别是负面作用增大。由于文化的失衡，或者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沙文主义的流行，生态环境在人类面前成为了被虐待的对象，是弱势的一方。”[7]在中国草原环境问题和区域环保政策层面上，呼伦贝尔各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实践和地方性知识经验值得参考和借用。“发掘利用少数民族生态智慧去利用和维护生态环境，不会损及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也不会打乱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多元文化相互制衡的结果，最终会引导人类均衡地利用地球上的自然生态资源。”[8]在传统均质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社会始终在无意识地进行调整，从而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9]

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国家政府和社会精英逐渐认识到呼伦贝尔草原自然资源的珍贵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文化生态的合理性，并确立坚实的环保理念和政策支撑，这无疑有助于恢复人地和谐互补的原有的文化生态系统。

三、历史互动特征

呼伦贝尔草原地域平坦辽阔，文化丰富多样，历史源远流长。远在旧石器中晚期，便有古人类活动在海拉尔河流域。一万多年以前，著名的“扎赉诺尔人”在呼伦湖一带繁衍生息，创造了呼伦贝尔最早的地域文化。之后，在呼伦贝尔广袤土地上还繁衍生息过东胡、鲜卑以及一直延续至今的蒙古、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诸多北方少数民族。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他对蒙古草原实行了“领户分封制”。1214年，成吉思汗将蒙古草原的东部分封给他的四个弟弟和德薛禅家族。大兴安岭以西地区，即现在的巴尔虎草原一带则是其大弟哈萨尔和二弟合赤温及德薛禅家族的封地，大兴安岭以东是其三弟帖木哥斡赤斤的封地。

17世纪初期，沙俄开始侵入黑龙江北岸广大地区，对居住在那里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人民进行驱赶抢掠。17世纪中期，世代代居住在黑龙江北岸和精奇里江一带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人民，被迫迁徙到嫩江流域居住。清政府将达斡尔人编为三个扎兰，将鄂温克族编为五个阿巴，受达斡尔、鄂温克及清政府派来的官员管辖，一切事务直属理藩院。1691年，清政府在“扎兰”和“阿巴”的基础上，组建了布特哈打牲八旗。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编制在八旗之内。在嫩江西岸建立了总管衙门，设满洲、达斡尔、鄂温克总管和副总管，辖八旗。

1732年，为加强呼伦贝尔边界地区的防守，清政府从布特哈八旗内抽调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兵丁3,000人（其中巴尔虎壮丁有275名），迁驻呼伦贝尔草原，编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左翼四旗驻牧在通俄罗斯道路边境一带，右翼四旗驻牧在哈拉哈河喀尔喀蒙古边界一带。不久，100多名额鲁特蒙古人从阿尔泰山一带迁来，驻牧在哈拉哈河一带，自成一翼编为一旗。[10]“1734年，居住在外蒙古车臣汗部的巴尔虎兵丁2894人，迁往呼伦贝尔，被编为‘新巴尔虎八旗’。”[11]新巴尔虎左翼四旗驻牧在哈拉哈河、乌尔逊河、呼伦湖东岸及海拉尔河下游两岸，新巴尔虎右翼四旗驻牧在贝尔湖北岸、乌尔逊河和呼伦湖西岸及克鲁伦河下游两岸。1918年，迁徙到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又于1922年附属于呼伦贝尔，并在锡尼河一带建立了布里亚特旗。这样，布里亚特文化与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巴尔虎文化和厄鲁特文化交织在一起，经过漫长的相互涵化过程逐渐构建统一的呼伦贝尔草原区域核心文化。1734年，在伊敏河西岸今海拉尔正阳街一带筑城，因其距呼伦湖和贝尔湖较近，简称为呼伦城。

进入20世纪之后，呼伦贝尔地区发生了影响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1949年4月11日，呼伦贝尔盟和纳文慕仁盟合并，称呼伦贝尔纳文慕仁盟，盟政府设在海拉尔市。同时将莫力达瓦旗同巴彦旗合并，称莫力达瓦旗；1951年，建鄂伦春旗，1952年改为鄂伦春自治旗。1958年8月，撤销索伦旗，建鄂温克族自治旗；撤销莫力达瓦旗，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1980年7月恢复兴安盟建制，将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扎赉特旗和突泉县划归兴安盟。呼伦贝尔盟辖13个辖市。1983年10月，撤销喜桂图旗，建牙克石市；撤销布特哈旗，建扎兰屯市。2000

年，呼伦贝尔盟改为呼伦贝尔市。行政区划的变动与其他社会变迁相结合，从而促进族际文化的继续互动。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呼伦贝尔草原地域文化现象是各民族、各族群、各区域群体在其长期的多层次历史互动和积累上缓慢建构起来的。可谓来之不易，稍纵即逝。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是蒙古族共同体形成之前的重要的原始部落之一，统一蒙古族形成之后也一直是以其浓厚的游牧社会文化占据草原文化体系的重要一席。巴尔虎部落历史悠久，迁徙万里，但始终保持着复杂多变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游牧文化。在巴尔虎、布里亚特传统游牧文化里可以观察到，原始社会采集狩猎阶段的典型生产生活方式遗迹或系统的文化特质以及后来的游牧社会文化系统的建构过程。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人所保持的游牧文化遗产是全国和全世界少有的温带草原生态知识财富。鄂温克族游牧文化、鄂伦春族狩猎文化和达斡尔族农耕文化也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和经济互动中形成和体系化的，而且与巴尔虎、布里亚特游牧文化进行持久多层互动，互补分工，相辅相成。作为特殊文化特质和文化丛，这些为呼伦贝尔草原多元文化系统的长期维持和自我平衡发挥了重要功能。

四、包容整合特征

呼伦贝尔草原地貌基本特征是平坦辽阔。呼伦贝尔高原是内蒙古高原东北边缘地带，海拔平均600-800m，呼伦湖一带只有540m，远低于内蒙古高原平均高度1000m，因此称其为高平原。巴尔虎草原最高地点为新巴尔虎右旗境内的巴彦乌拉山，海拔为1011m，而锡林郭勒草原东南部地区，则平均海拔接近于1200米。即使巴尔虎草原东部大兴安岭山区海拔略高一点，但其最高峰特穆尔山也只有1725m，远低于大兴安岭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的洪格乌拉山2029m和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高日罕山近2000m高度。呼伦贝尔地区基本上是以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均不很突出的平坦高平原和森林草原为主体的。

呼伦贝尔草原地貌、气候和植被具相对多样性，民族历史文化多元且持续演进，这在客观上促成各民族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模式。但同时整个呼伦贝尔地区处于典型的北半球中温带干旱草原和寒温带森林草原，因此也具备了各草原森林民族共有的开放性社会文化特征。即各民族在广泛的史地时空内建立起持续而稳定的经济文化互补关系。呼伦贝尔草原与锡林郭勒草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单一蒙古民族各族群的单一游牧文化整体，而前者则是在多样化自然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形态上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在内的复合多样体系。

历史上呼伦贝尔地区是许多北方民族繁衍生息、发展退缩的广泛平台。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互动及族际经济历史互动过程中各民族主动选择了以逐水草而居和人地融为一体为核心理念的游牧经济文化模式。这在行为上体现为自然祭祀和长距离迁徙。该地区各民族现住地盘大多与后来迁徙活动有关。巴尔虎蒙古族和额鲁特蒙古族进住呼伦贝尔已近三百年；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也有数百年的居住史，布里亚特蒙古族有近一百年的居住史。在历史的迁徙游动过程中，各民族通过文化制衡，保持差异，积极交往，持续互动，并逐步具备包容整合特征。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都是在许多区域文化传统的交流过程中，经过普遍化的共同才完成的。逐渐形成了的民族传统文化，再向更广泛的区域传播时，再经过地缘化过程，与地方土俗文化模式边竞争边融合，再过经地方文化的吸收、修正和消化，发展了形态不一的多样化区域文化。这种多样化的多向的传播与融合，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小传统，具体地体现着大传统的本质及其某些层面。”^[12]

呼伦贝尔市各少数民族均居住于较为相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普遍信奉原始自然宗教——萨满教。语言均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达斡尔语同属于蒙古语族；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同属于满通语族北语支，再加以考虑相同经济因素，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结合点自然会更多，更为密集，终于成为呼伦贝尔草原地域文化包容整合特征的重要内在动力。呼伦贝尔地区各民族在现代化、城市化大环境中越来越多地进行文化接触和交往。这会促使族际社会文化的包容整合程度继续得到提高。但是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经济利益与社会文化全面重组的剧烈过程，并将会使脆弱的传统生态文化系统处于崩溃边缘。如此巨大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代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思考的世纪课题。

综上所述，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持久互动中形成的地缘文化内涵丰厚的呼伦贝尔草原文化的多样文化、生态环保、持久互动和包容整合四大特征既很突出，又成整体，互不离开。即这四大特征整合成为呼伦贝尔草原文化的地域性。这可谓在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体系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魅力。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北纬 46°以北中温带和寒温带自然地理环境中绝无仅有的多元立体民族文化特殊区域。对其生态保护思路 and 传统人文经验的吸收与发扬有助于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棘手问题。

参考文献

- [1]鄂伦春族简史[M].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168.
- [2]周尚意，孔翔，朱竑编著.文化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
- [3]韩有峰，都永浩，刘金明.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4. 201-202.
- [4]金炳镐.中国自治州的民族关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69.
- [5]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0.
- [6]钟林生，赵士洞，向宝惠.生态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46.
- [7]张全明，王玉德.生态环境与区域文化研究[M].武昌：崇文书局，2005. 2.
- [8]罗康隆.发展与代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26.
- [9]董建辉.政治人类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127.
- [10]呼伦贝尔盟地方志办公室编.呼伦贝尔盟情[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 [11]李·蒙赫达赉.巴尔虎蒙古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494.
- [12]乌丙安.民俗文化新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22.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land Culture in Hulun Buir

Ao.Chahlun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 010021 China)

Abstract: Taking its shape in the sustain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in Hulun Buir, the grassland culture of Hulun Buir, with rich connot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has the following four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diverse cultur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ustaining interaction and inclusiveness and incorporation,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from one another. These four featur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gionalism of the grassland culture of Hulun Buir that has an overwhelming advantage in the grassland culture system of northern China. The grassland in Hulun Buir is the only area with diverse ethnic cultures in the middle temperate zone and cold temperate zone in China north of the latitude of 46° north. The author holds that if the idea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humanistic experiences of the grassland culture of Hulun Buir are learnt and carried forward it will help to 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ey words: grassland culture of Hulun Bui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diverse cultur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clusiveness and incorporation

收稿日期: 2007-12-16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鄂温克族现代游牧社会文化研究》(04BMZ006); 内蒙古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文

化变迁与文论发展——20 世纪前半叶蒙古文论研究》(06B052);

作者简介：敖·查赫轮（1973—），名孟和乌力吉，敖·查赫轮是其笔名，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生态艺术、民族政治学、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